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郭永平◎副主编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

——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外借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郭永平◎副主编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

——
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 / 行龙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 - 7 - 5203 - 2278 - 2

I. ①在… II. ①行… III. ①永济—地方史—调查报告
IV. ①K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05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334 千字
定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研相长七书”总序

“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 and 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20 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 年 5 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 106 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 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

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10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10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们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

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14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意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① 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页。

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 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前 言

—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陘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以上是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①中对于山西“山川形胜”的描述。^②山西东立千里太行巍峨屏障，西伏吕梁缠绕汹涌九曲黄河天堑，北临内蒙古苍茫塞外大漠，南踞汾河两岸富饶原野沃土，历来被认为是“表里山河”^③。这一方夹峙于黄河峡谷和太行丛山之间呈桑叶形的黄土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曾经生活在这里。继炎、黄二帝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得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据《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阳是现在的临

① 顾祖禹：《山西方舆纪要·序》，见《读史方舆纪要》。

②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今天山西省省界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关于“山西”这一地域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参见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的山西路》，《晋阳学刊》1977年第2期。

③ 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汾，蒲坂在运城永济，安邑在夏县，因此尧舜禹的统治中心都在今天的晋南。显然，最早的中国就在晋南。继尧舜禹之后，历史进入了夏代。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从陶寺遗址年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彩绘龙盘所属的族属等诸多方面，均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原大地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陶寺遗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① 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应该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不论是从史籍记载，还是考古发掘，以及历史地理、民间传说，都印证了“中国”一词最初就是指山西“晋南”一带，而舜继位要“之（到）中国”，汉末学者刘熙就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秦汉，此时的中国早已非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所说的中国。但是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是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年的事情，陶寺文化遗址所处的晋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易于耕作，且气候湿润，这为远古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晋南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② 新石器时代，山西南部属于“中原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山西北部又属于“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特色，但也有相互交融的迹象，从整体来看，山西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③ 因此，山西是黄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此就晋南展开区域社会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山西区域历史、透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④，认识黄土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

①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基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②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1页。

③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47页。

价值。

二

正是在上述学术考量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师生多年来将目光聚集于晋南这个具有厚重历史的区域，本着“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理念，在召开国际会议、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基础上，撰写了丰富的成果。^① 2010年8月10—13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水利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会议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大阪教育大学、长崎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南大学和大陆多所高校20余名学者提交的27篇论文。与会专家多为近年来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学科背景多元，包括了历史学、人类学、水利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与会代表围绕“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环境”“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社会”“中国北方水利社会史”“中国南方水利社会史”“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五个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争鸣。2011年8月8—10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山西区域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永济市召开，会议议题主要有五个，分别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史”“山西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蒲州历史文化与社会”。

在召开学术会议的同时，山西大学还在晋南的永济建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永济地处山西省西南端，运城盆地西南角，位于晋、秦、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是山西省的南大门。永济西临黄河与陕西省大荔县、合阳县隔河相望；南依中条山与芮城县接壤；东邻运城市；北接临

^① 例如，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周亚：《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水利与社会变迁——以晋南龙子祠泉域为例》，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猗县。永济古称蒲坂，上古唐虞时代为虞舜建都之地。商属缶邦，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属河东郡。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建蒲反县，属河东郡。新莽改为蒲城县，属兆阳郡。东汉建武元年（25）改蒲城为蒲坂县，属河东郡。永济在南北朝时期隶属于泰州、蒲州，唐朝两建中都，蒲州成为六大雄城之一。金天会六年（1128）降河中府为蒲州，河东县属蒲州。天德元年（1149）升蒲州为河中府。明洪武二年（1369）改河中府为蒲州，省河东县，直隶于州，属平阳府。清雍正六年（1728）升州为府，置永济县，属蒲州府。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二十五日解放，九月同虞乡县合并，称永虞县。先后属太岳区第三专署，晋绥区临汾工委第十一分区，陕甘宁边区晋南行署运城分区，山西省晋南专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九月属山西省运城专区。1950年4月25日，永虞分治，复设永济县，属运城专区；1954年属晋南专区。1970年属运城专区。1994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永济撤县设市，属运城地区。

永济人文荟萃，唐多文士，宋多画家，明多官员，清多艺人。境内有五老峰之奇，王官谷之幽，唐开元铁牛，鹳雀楼等。2016年人口为45.6万，面积1208平方公里，现辖3个街道办事处、7个镇，分别为城西街道、城北街道、城东街道，虞乡镇、卿头镇、开张镇、栲栳镇、蒲州镇、韩阳镇、张营镇。

永济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近年来，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文献保护、蒲州故城开发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2013年“山西大学历史学实践教育基地”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共建方为永济市委。2014年5月26日下午，山西大学历史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挂牌仪式在永济市隆重举行。基地的建立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会促进永济市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在校学生提供校外实践的机会，将课堂知识和课外实践结合起来，提高资料搜集、学术研究、认识社会等方面的能力。仪式活动结束后，以永济市（县）域为单位的田野调查和民间史料的搜集、整理正式启动，现将两次集体调查情况记录如下：

第一次永济集体调查是在2014年5月26日—6月1日，共有师生20人，分为五个组：第一组带队老师是胡英泽教授，学生为郭佩祥、冯玲、马红玉，调查地点为张营镇、城西街道；第二组带队老师是张俊峰教授，

学生为武丽伟、高婧、郭心钢，调查地点为蒲州镇、城东街道；第三组带队老师是李嘎副教授，学生为边疆、李佩俊、王堃，调查地点为韩阳镇、卿头镇；第四组带队老师是赵中亚博士，学生为张力、张爱明、董秋伶，调查地点为开张镇、城北街道；第五组带队老师是郭永平博士，学生为陈霞、李晨阳、侯峰峰，调查地点为虞乡镇。

第二次集体调查是在2014年8月10—14日，由胡英泽、郭永平两位老师带队，参与学生为梁锐、李晨阳、张爱明、张熙、陈慧琴、任耀星、贾佩、彭玥、武学茹。在此期间，师生们奔赴永济市虞乡镇，重点对东源头村、南梯村、洗马村等村落展开了深入调查。本次调查是在五月份调查基础上的一次深度回访，通过回到历史现场，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使时间的历史与空间的历史连接起来。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获取真正的认同，在体会到“同情之理解”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对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

调查期间，广大师生不避酷暑，行走于永济的村落与社区，实践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调查结束后，带队老师亲自指导学生进行田野报告的写作。因此，《永济篇》实际上也凝聚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各位老师的心血。为了不至于使得印书太厚，影响阅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选取了调查报告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文本的形成过程来讲，正文编排次序应该是田野日记、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但是为了遵循阅读习惯，编者将顺序进行了调整，现在读者看到的是田野日记——调查报告——学术论文这样的顺序。

三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认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人类学理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社会史的研究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在这里“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

^① [法] 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0页。

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①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从家乡资料的收集开始做起；第二，跨越了“文野之别”进行口述史访谈，以此实现了对“他者”的了解与理解。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秉持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学术思考。早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系教授乔志强先生就倡导走出校园，走向田野。并且他自己也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资料收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收集，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上谕、奏折、审讯的记录稿本；第二，走向田野与社会，采访当事人后人，“访问其他当地老群众”，同时也注重对民间传说文献的搜集。1991年，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被山西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同年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下简称中心）；1996年，乔志强和乔健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欧盟课题，赤桥村被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这些都是“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实践印记。

1997年，行龙教授就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田野与社会”向常规化发展，也成为了中心的基本理念；2002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行龙教授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②出版；2006年下半年，中心又请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还亲自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行龙教授的另一本书《走向田野与社会》^③出版。在此情况下，走向田野与社会也被认为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④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② 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④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历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料学，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而研究的前提是占有资料，这就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指导下，挖掘乡土社会资源，大量收集第一手的、独具个性的原始资料成为中心老师到学生的基本功。每年的寒假和暑假，中心老师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亲身实践着这样的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今天，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践行着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形成了水利、晋商、灾荒、秧歌、贱民等专题特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渠册、碑刻、秧歌剧本、契约文书和民事诉状、晋商商号账册及生意经、村史、家史等山西民间资料。中心许多学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就是依靠这些资料完成的。这数千万件的基层资料来之不易，这是中心三代师生心情积累的结果。而“走向田野，深入乡野，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①。

实际上，档案资料也是一种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得到巨量的信息除了坚持不懈地走向田野与社会之外，如何去呈现、使用和传播这些信息无疑更是一种智慧。在收集到这些档案资料后，进行分类、整理，入档本就是一件相当费时、费苦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信息共享毕竟只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这些年来，中心一直在探讨怎样将这些资料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山西、了解基层社会，了解集体化时代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为更好地为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便利。正是在此种考量下，中心开始了“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计划利用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将这数百万件档案资料扫描，上网，实现共享，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对“走向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8页。

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中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如今，这样的理念已经成为了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山西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镇。^①

在调查与书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永济市委、市政府，各乡镇领导、相关单位和同志的认可与支持。没有他们的切实帮助和引导，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永济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谢谢他们给予我们的照顾与关怀！

最后，谨以永济调查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名义，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永济各位领导、各相关单位，以及老师、同仁、朋友，特别是各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们，表示真诚感谢！同时，还要感谢永济市的普通民众，我们的调查与访谈经常打乱他们正常的生活，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调查不可能如期完成。他们是文化的持有者与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最应该被铭记的群体！

总之，社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他者”、关怀“他者”、体贴“他者”、倾听“他者”、欣赏“他者”，秉持“我者”和“他者”平等的理念，尽量为“他者”服务，才能实现学科的终极关怀！《永济篇》是中心学生实践篇，也是中心发展、壮大的成长篇，同时也是一个阶段性小结，而这样阶段性小结体现的是社会史中心师生一段学术实践，一份人文关怀。面对三晋大地这样一个学术“富矿”，还需要我们迈开坚定的步伐不断走向田野与社会，以此来回报勤劳、朴素的山西人民，而这不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关怀吗？！

编者

2015年11月于山西大学鉴知楼

^① 李金铮：《社会史重镇何以炼成？》，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风华正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2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7—99页。

目 录

前言	(1)
----------	-----

学术论文篇

“乡土中国”在永济	(11)
20 世纪后半叶鹿峪村的人口、家庭与婚姻	(28)
生计多样与职业分化	
——晋西南农民的生存策略	(44)
清末以降虞乡东、西源头村的社会经济变迁	(59)
集体化时代以来的乡村精英	(71)
家谱数据化的尝试	
——基于山西蒲州杨氏宗族的个案研究	(89)
永济市朱小张村《朱氏家谱》研究	(102)
洗马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111)
从他乡到故乡	
——以集体化时代东源头村移民为考察对象	(123)
成分与身份	
——集体化时期永济农村基层干部选拔研究	(131)
地方学者的优势与困境	
——基于永济虞乡的田野调查	(140)

调查报告篇

张营镇、城西街道田野考察札记	(153)
韩阳镇和卿头镇的乡村聚落考察	(161)